

导言

17—18 世纪的北京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 16 世纪末，即朱明建国二百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是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益一日地紧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的、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 17 世纪的时候，1601 年 1 月，一个身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

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涉及天文学、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学、建筑学、动植物学、人体科学、医药学、心理学，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当然还有宗教文化），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在这里演出，虽经几起几落，却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如果确定一个终点，就笔者所见，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 1773 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1775 年此消息传入北京），就明显地减弱了，而英国的 1793 年马嘎尔尼勋爵、特别是 1816 年的阿美士德勋爵两个使团访华的失败，则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①。

早在 16 世纪初，早期向东方扩张的葡萄牙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占领了麻刺甲（今新加坡一带）之后不久，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就给他的一位到东方的臣民下达了指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

① 林金水先生说：“它（西学东渐）始于 1582 年利玛窦的来华，迄于 1773 年耶稣会的解散，前后二百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方豪先生称：西学东渐“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禁教之时为止”（《中西交通史》第 4 册，台湾 1954 年版，第 3 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David E. Mungello 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1582—1793)》一文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 1582—1793 年。（（葡）Luis Sa Cunha 主编《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澳门文化署 1994 年出版，第 111 页。）

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以及“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和什么国家接壤？”^①等等。

1513年（明正德八年），若热·阿尔瓦雷尔（Jorge Álvares）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葡萄牙商人。但是，依照中国的法律，他只能作短期停留，贸易后即行离去。1515年（正德十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一名正式的使臣，一个在其刚刚出版的《东方记》里对中国称赞备至的、名叫托梅·皮雷斯的人荣膺此任。他携有葡王的正式国书，由四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护送，于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抵达广东。这也是欧洲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臣。

但在这以前一百年就有郑和下西洋壮举的中华帝国，对葡萄牙这个欧洲国家却一无所知。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礼炮使主人感到震惊，以为对方是在寻衅滋事。

明朝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其对外政策基石，与之交往的外国不是藩属，便是敌国。当朝廷得知这个从来没有朝贡称臣的佛郎机国（即葡萄牙）使臣求见时，便轻易地拒绝了。

《明实录》记载道：“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予之。”^②

葡萄牙使者吃了闭门羹后，并没有放弃，而是留在广州

① 《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转引自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等待机会。一年之后，葡国使团的一个“通事”（翻译）火者亚三通过行贿佞臣江彬而见到了明武宗，并获得武宗好感。鉴于明廷对不曾来往过的葡萄牙国存有偏见，火者亚三便自称为麻刺甲的使臣。于是明廷改变初衷，允许该使臣进京。

葡使一行于 1520 年（正德十五年）1 月再度北上，经过四个月的行程到达南京。当时明武宗恰好就在南京，但无意接见葡使。使团只好继续北上，在北京等候武宗回銮。又过了一年，1521 年（正德十六年）1 月，武宗总算回京，却大病不起，很快便一命呜呼了。这时正好被葡萄牙占据了国土的麻刺甲国王的使者来到北京，请求帮助以恢复国家，同时戳穿了火者亚三的谎言。于是在武宗死后不久，明廷即下令：包括葡萄牙使团在内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火者亚三因冒充麻刺甲使臣被处死。葡萄牙使臣皮雷斯在广州被押进监狱，不久就病故在狱中。当时在广州的城门上榜示着皇帝的敕令：“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入境。”^①

这就是葡萄牙来华的第一位外交使臣，同时也是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臣的命运。

第二个遣使来华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荷兰的商船第一次出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是 1604 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但他们的通商要求也被拒绝了。三年后，当他们第二次遭拒绝后，荷兰海军的 15 艘战舰向澳门开了炮，结果是连同司令雷伊松上将在内的三分之一的荷军葬身鱼腹，残兵败将撤到了台湾，后来又被郑成功赶下了大海。荷兰人后来同意非常屈辱地每年进贡，以取得他们所十分希望得到的贸易的许

转引自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1 页。

可。但是“即令做出了这样的屈服，他们仍未得到这个许可”^①。一种更为尖刻的描写称：“他们（指荷兰人）像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在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像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礼者们认为合适，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礼。”^②但是，即使是这样，荷兰人仅仅得到八年一次、每次四艘商船的贸易机会。而相反，这更使中国人确信，中国是惟一的中央帝国，其他各国都须向中国俯首称臣。

距离中国最近的欧洲国家俄罗斯，在明万历年间（1616—1618）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使者。因为没有带来令中国人感兴趣的贡物和以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俄使根本没能见到皇帝就被打发走了。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另一个俄国使者巴伊科夫来到北京，他坚持必须按照西方的惯例，先见皇帝，递交国书，然后才进献礼物。而且在晋见皇帝时，拒绝遵循中国的叩头的礼节。他的态度“激怒了中国朝廷。于是将礼物退还，并下令着巴伊科夫离开北京”^③。

这就是明王朝对打算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的态度。要打开这扇紧闭的大门真是比登天还要难。

二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

①（葡）徐日升《徐日升日记》第16节，转引自（美）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著，王立人译《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2页。

②（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5页。

③《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59、61页。

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的，也是这些以其先驱利玛窦为代表的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6 世纪四五十年代，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密友沙勿略 (Saint Francois Xavier)^① 来到东方，他在日本试行了后来被称作“适应政策”的若干做法。但是沙勿略没有来得及在中国实现自己的设想，就于 1552 年 12 月死在名叫“上川”的小岛上。

葡萄牙正式的外交使团被中国拒之国门之外，但是葡萄牙的商人却以行贿和欺骗的方法得到了一块可以落脚的飞地——澳门。然后手擎十字架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抱着“欧洲人至上主义”的传教士们，在沙勿略死后的三十一年间，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但都碰壁而归。^②

1574 年，新任的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 (Alexandre Valignani) 从果阿到日本去，第一次路过澳门，并在那里住了九个月。这期间他仔细观察和思考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

本书中出现的传教士如有中文名字，尽量采用，并在必要时注明其原名。

原名以 (法)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和 (法) 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为准。

② Joseph Sebes, S. J. 'The Precursors of Ricci' 一文中指出：“在 (沙勿略) 以后的三十一年里，他的同仁和继承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始终未有大的成绩。就算有些人能成功进入 (曾有 25 人) 也未获得居留，只好在短期内离开。”他在文中记述了这 25 人的情况。见《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 62 页。

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①。在一种全新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先后被派到澳门，学习中文，继而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住了下来。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两位神父以及他们的上司范礼安一致认为，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到北京去，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 1588 年 9 月的一封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② 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仅仅因为要占有他们的住所，就险些将他们驱逐出中国，使他们多年惨淡经营的传教事业几乎毁于一旦的教训，更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在失去了肇庆的定居点后，利玛窦选择了韶州作为新的定居点，就是因为“它是去南京和北京的必经之地”^③。

1595 年，利玛窦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兵部尚书石星同行，离开韶州北上，到达陪都南京。他虽然没能在南京长住，却获得了在南昌的定居权，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两年后，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新建立的中国教区的第一任会长，在接到任命书的同时，他还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即尽一切努力到北京去开辟一个定居点，以便影响皇帝，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得到保障。1598 年，利玛窦第一次

① （美）魏若望（J. W. Witek）《The Missionary Strategy of Matteo Ricci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见（意）Francesco D'Arelli 编《LE MARCHE EL'ORIENTE》，罗马 1998 年出版，第 36 页。

② 《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 1986 年版，第 89 页。
同上书，第 94 页。

进入北京，同样没有成功，返回后却得以在南京定居一年多。利玛窦就是这样进两步退一步，再进两步再退一步地顽强地向着他的既定目标——北京前进。最后他终于成功了。

1601 年，利玛窦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 200 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①，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②。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 1601 年进入北京，到 1610 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这期间，他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建造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

① 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人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六。

②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17 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堂，并把它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和宗教的博物馆；这期间，他通过对北京经纬度的实地测量，断定北京就是“汗八里”，而契丹就是中国北方的一部分，从而解决了困扰西方学术界多年的“北京与汗八里”、“中国与契丹”关系的疑团；这期间，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 19 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当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便着手撰写回忆录，这部手稿后经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补充整理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史》^①的标题在欧洲出版问世，该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的经历和他对中国的认识，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教会了宫廷乐师（太监）弹奏西洋铁琴；同时庞迪我也向欧洲寄发了大量书信，其中有写于 1602 年的长达几百页的一封信以《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的题目于 1605 年出版，将被西方人认为是“神秘之国”和“神秘之都”的真实面貌介绍到欧洲。

利玛窦首先用以打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吸引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

该书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于 198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会士们不仅顺利地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汤若望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钦天监的洋人主管，而且获赐通政大夫、太常寺卿、光禄大夫等职，成了顺治皇帝无话不谈的“玛法”，得到“通玄法师”的封号。虽然在顺治皇帝死后，汤若望遭遇冤案，其他各地的传教士被强行解至广州，但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做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内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策划和组织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 100 卷的《律历精蕴》和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与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中国，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

三

作为北京在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的内部原因，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科学技术的需要和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的需求。如果说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主要是属于个人兴趣的话，那么从天启年间

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和测绘地图等等，则更多的是出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要，不管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企图挽救自己，还是一个新建的王朝企图巩固自己。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位于宣武门教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时宪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曾一度成了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其卓越才华的地方。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来以农立国，靠天吃饭，因而崇拜上天。中国的皇帝也自称为天之子，所以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天文历法。中国曾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天文记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天文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为了远航导向的需要，欧洲的天文历算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以及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发生的天象每一次都与利公测算的结果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所预测的时间，几次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鹊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时宪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

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先后服务其中。

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汤若望却仍坚守在南堂，保护着尚未镌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袞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安国宁、索德超、汤士选、李拱辰、福多明我等相继主持钦天监，直到最后一任的毕学源。其间还有任监副职务的安多、徐日升、鲍友管等人。^①主持钦天监的神父们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60页载有1644—1805年任钦天监的耶稣会士名录和任期表。笔者参考各位耶稣会士墓碑碑文，对该表内容做了若干修正。

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天启六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便忧郁地死去了。西洋大炮的使用曾一度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次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三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造的大炮，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康熙甚至将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

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了解欧洲国家的情况，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而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国家频频向中国派遣使团。因此传教士们在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办理交涉时，担任了翻译的工作，实际上也起到外事顾问的作用。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有专家认为，徐日升和张诚“起了保证实现康熙的意图的私人监督者的作用”^①。

1655 年（顺治十二年）7 月 20 日，荷兰使者又一次来华，向皇帝进献礼物。汤若望担任翻译。他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的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 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十年后的 1686 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1686 年闵明我奉旨出使欧洲，康熙皇帝派他为驻罗马和莫斯科的私人大使，会见俄国沙皇，以便解决中俄在满洲边界的争端。

中俄在尼布楚的谈判，是我国第一次与外国进行的平等谈判。由于康熙皇帝面对俄罗斯和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叛军两方面的威胁，不得不与俄国寻求一项妥协办法，以便集中力量平息噶尔丹的叛乱。他意识到，与以往对外交往所涉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 109 页。

及的“对中国无关紧要的贸易”不同，此次谈判事关重大，“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然而，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①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员缺少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处理相关国家间的纷争的概念，也没有与外国签订合约的经验，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

徐日升和张诚果然不辱使命，对俄国使者折冲樽俎，促成了条约的签订，使康熙皇帝的整个战略部署得以实现。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的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就是对徐日升、张诚的回报。

18世纪初，教皇特使铎罗来华，德国籍的传教士纪理安是在双方斡旋中参与交涉最多的人。其他的耶稣会士如戴进贤、刘松龄等，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俄国使臣伊斯曼诺夫来华，戴进贤奉命作康熙皇帝的口头翻译，并将俄使的国书译成中文。1752—1753年（乾隆十七年至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白晋、张诚用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而得到建造北堂

^①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114页

的赏赐。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世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世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作为首都，原本就是文人精英荟萃之地，有记载云：“利玛窦在平常的日子，接待来访的人不下二十批。每逢节日来访的人更多，每天接待的人达 100 人以上。”^①再加上几年一次的全国举子会试和官员的朝觐及大计，大量的文人和官员定期地聚集在北京。特别是在利氏生命的最后一年，即 1610 年，既是朝觐之年又是会试之年，5000 多名官员和 5000 多名考生聚集在京师，数以千百计的文人争相一睹利子之风采和教堂里的西洋奇器。利玛窦曾为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慕名来访者忙得疲于奔命。然而西学、西器以及利玛窦等传教士撰写的和翻译的书籍，便正是以此为渠道，向全国扩散。

不仅如此，由于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实际上成为了“东方文明的交汇点”。法国学者裴化行写道：“尽管边境緼

^① 《利玛窦与中国》第 130 页。

查严加限制，它（指北京）始终是吸引的中心，整个东方都围绕着它旋转。”^① 早在此时，朝鲜人就知道他（指利玛窦），因为他们每年都有使臣到北京来，不仅带回去商品，还带走书籍和科学情报。^② 作为西方科学文化“展览馆”的南堂，也经常出现在朝鲜人的笔下。黄时鉴先生在《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③ 一文中对此做了专门的搜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清初时期，朝鲜国王李淙的太子曾作为人质住在北京，汤若望与他结识，送给他一架天球仪、一幅基督圣像和一本世界地图。当他回国时，就将这些西方文化的载体传到了朝鲜宫廷。此外，很多到北京贸易的穆斯林商人都认识利玛窦，以至“利玛窦名声远扬，甚至达到戈壁滩的尽头”^④。虽然日本在朝鲜战争战败之后中断了与中华帝国的官方贸易，但民间交往的渠道并未完全断绝，《几何原本》和世界地图也很快就传到了日本。

可见，当时的北京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整个东方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四

帮助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他们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认识作用、宣传作用、帮助作用、中介作用和保护作用。

① （法）裴化行著，管振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573 页。

② 黄时鉴《东西文化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5 页。

③ 《利玛窦评传》，第 580 页。